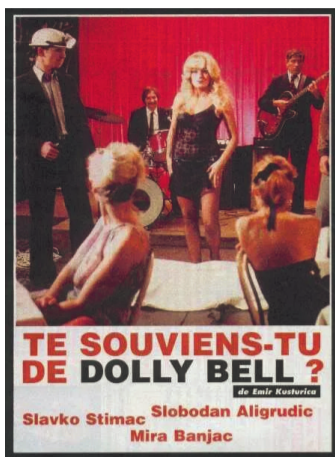


库斯图里卡： 在民族和历史深处拍电影

□钟芝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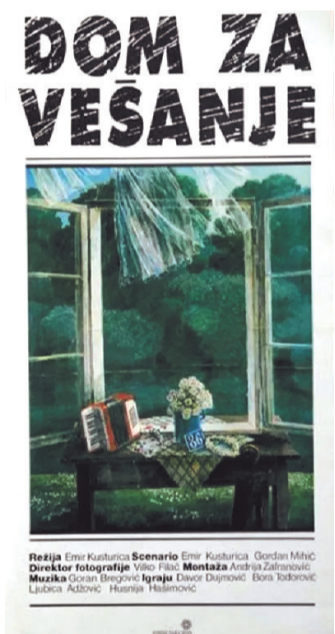
埃米尔·库斯图里卡



《你还记得多莉·贝尔吗?》电影海报



《爸爸去出差》电影海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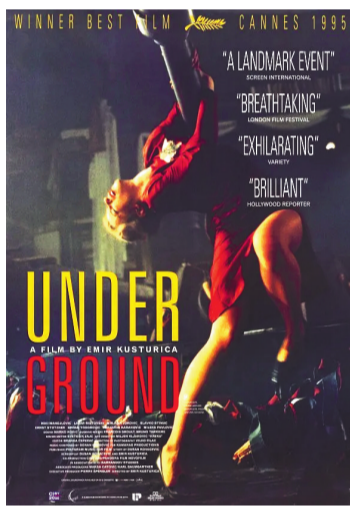
《流浪者之歌》电影海报

埃米尔·库斯图里卡(Emir Kusturica)是塞尔维亚著名电影导演、编剧、演员和音乐家,是当代为数不多在戛纳、威尼斯与柏林欧洲三大电影节获奖的导演。2024年,库斯图里卡担任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“天坛奖”国际评委会主席,其作品回顾展也在特别放映单元展映。5月8日,习近平主席在出席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的欢迎宴会时指出,德约科维奇、约基奇、库斯图里卡等塞尔维亚体育界、文化界著名人士在中国家喻户晓。

库斯图里卡以喜剧、狂欢、荒诞、魔幻现实主义、讽刺、超现实和历史叙事的电影风格闻名。很难用现有的影人风格归类库斯图里卡,因为他的作品太独特了——业已消失的国家如何叙事?库斯图里卡于1954年出生于南斯拉夫萨拉热窝,他的电影充满撕裂、不安与反传统的希望。

土地、民族和乡愁

库斯图里卡用电影呈现世界与土地的紧张关系,以南斯拉夫解体为分界点,其电影风格分为两个阶段。1992年之前,库斯图里卡关注南斯拉夫的社会现实,叙事完整且复杂,多用儿童视角叙事探



《地下》电影海报



《黑白猫》电影海报

索大时代下的民族身份建构,以公民在铁托时代的遭遇回应政治隐喻。南斯拉夫解体之后,库斯图里卡确立了标志性的电影风格,从现实主义叙事迈入魔幻现实主义叙事,创意天马行空,擅长用荒诞、狂欢和幽默的方式解构历史的沉重感,寻找已不存在的乡愁。

库斯图里卡和电影的渊源从少年时期就结下了。为了赚点零花钱,库斯图里卡去街头给电影剧组帮忙。他曾在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(1972)中客串游击队员。1974年,19岁的库斯图里卡前往布拉格电影学院学习,看了意大利电影大师包括费里尼在内的大量电影。他的毕业作品《格尔尼卡》延续了《阿玛柯德》的风格——“要拍摄这个世界上的人类,人的面孔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环境。”费里尼去世后,库斯图里卡坦言“我第七艺术世界里的父亲走了”,信徒如他,“在20世纪的末尾成了孤儿。”费里尼和库斯图里卡的拍摄风格不尽相同,但库斯图里卡抓住了费里尼最精确的一面——用内心的现实主义,拍摄人和土地的关系。

作为南斯拉夫存在到消失的亲历者,库斯图里卡用摄影机记录一切。处女作《你还记得多莉·贝尔吗?》(1981)探讨孩子的成长问题,获1981年威尼斯电影节处女作金狮奖。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“将摄影机扛到大街上”一致,电影取景于萨拉热窝街头,这是萨拉热窝人民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自己的处境,让全世界知道他们的悲剧。多莉·贝尔是年轻漂亮的舞女,对待感情纯真,却被男人剥削。迪诺暗恋多莉·贝尔,她被带走后,他的兔子也死了。库斯图里卡用多莉·贝尔的角色暗示这片动荡的土地。

第二部电影《爸爸去出差》(1985)获得戛纳金棕榈奖,可对标《小孩与鹰》《饲养乌鸦》之类的优秀儿童电影。影片延续了第一部的儿童视角,更加多元、复杂,讨论国家动荡对个人心灵的创伤。通过孩子马克的视角,展现了一个理想化、脆弱、矛盾且风流成性的父亲形象。1948年,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剑拔弩张,父亲被错误地指控为“斯大林主义者”,下放到采矿场劳改。马克眼里的父亲既是伟大的,他告诉别人,“已经没了祖国,至少该有个孩子”,同时也是一个不忠于母亲的男人。寻找父亲、母亲,是文学与电影创作常见的主题。虽然库斯图里卡对安哲罗普洛斯有些微词,但两人的创作存在相似之处。他们同样成长于动荡的战争环境,关于民族与命运的探讨是电影创作的母题。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经常寻找“希腊父亲”的民族根源,《雾中风景》结尾,两姐弟终于来到边境,雾气散去,一棵树在地平线隐现,生理意义上的父亲不再重要。《爸爸去出差》你还记得多莉·贝尔吗?》中的“父亲”,是一个“想参与到大历史中的小人物”,是属于“契诃夫小说里的人物”,乃至后期电影中许多失去祖国的父亲形象,他们不仅代表具象的父亲,同样是库斯图里卡一直在

寻找的“南斯拉夫父亲”。

《流浪者之歌》(1988)是奠定后期库斯图里卡电影风格的转型之作,展现了巴尔干半岛吉普赛人浪漫、粗犷和颠沛流离的生活,获1989年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。这是一个被主流放逐的地区,巫术可以治病,穿着洁白婚纱的新娘跑到郊外,升到空中生下一个男孩,然后死去。山羊、大白鹅等贯穿库斯图里卡创作生涯始终的动物出场。手风琴作为重要的音乐道具频繁出现。

同年,库斯图里卡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电影系教授职位,携家到纽约。就在离开前,南斯拉夫即将解体的消息已经开始传播。“1992年,父亲去世了。”人们失去了祖国。《爸爸出差时》时期,人们对铁托时代还抱有一丝甜美的幻觉。在国庆典礼上,马克被选中给市长献指挥棒,爸爸严肃地预演动作,烫毁国旗。到了《地下》(1995),荒诞和讽刺到达巅峰:“二战”期间,一群人躲进地下室避难,定居,相信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,人会重获自由,而能和外界联系的犹太欺骗他们说战争没有结束,一骗就是二十年。

视与听

库斯图里卡有极为敏锐的导演意识。他曾提到霓虹广告牌的灯光令人难以忍受,但忽然意识到将光线转换成声音,是一个导演非常重要的品质。电影的视与听是一体的,电影是视听艺术,在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,音乐是传递情绪的媒介。在导演身份之外,他是南斯拉夫摇滚乐队“无烟地带”的贝斯手,《巴尔干朋克》(2001)记录了乐队在欧洲巡演的经历。和用影像“寻父”一样,“无烟地带”用音乐寻找南斯拉夫的根源。

库斯图里卡电影中的音乐,充满了野性、热闹、辛辣、狂欢的吉普赛风情。《生命是个奇迹》(2004)的背景是1992年南斯拉夫内战。乐队在雪地里演奏,其中一人被枪击,死在骡子旁边。最常出现音乐的场合是婚礼。婚礼在常规电影中往往被赋予洁白、庄重与喜庆的象征,意味新人珠联璧合。库斯图里卡的婚礼,却是一出混杂悲喜、喧嚣、滑稽、用枪助兴、鸡飞狗跳的巴尔干狂欢。

婚礼是库斯图里卡电影的典型情

节,通常手持摄影增加现场的真实感,用深焦镜头展现现场布景的复杂,同时用快速剪辑加剧戏剧冲突。《流浪者之歌》有两场婚礼。第一场婚礼,贝汉愤怒于妻子的“不忠”;第二场婚礼,贝汉带着仇恨,前往阿梅德的婚礼并杀了他。手风琴声、小提琴声、打击乐器声、枪声和尖叫声混合在一起,热闹的音乐衔接阿梅德的婚礼和贝汉的葬礼,做了一个漂亮的转场。《黑猫白猫》(1998,获第5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)全程围绕巴尔干婚礼叙事。乐队在树上演出,在葬礼后参加婚礼。牧师不小心把死亡证书当作结婚证书。影片同样有两场婚礼。第一场婚礼,两个吉普赛家庭决定促成扎雷和阿佛罗狄塔的事。年轻人不愿意结婚,扎雷有心上人,阿佛罗狄塔逃婚,现场一度混乱。第二场婚礼,发生在阿佛罗狄塔逃婚途中和男人一见钟情、也是第一场婚礼的当天。结尾时,逃婚成功的新人坐上公交车,眼神却愈发迷茫。库斯图里卡的婚礼,不提示观众是否存在皆大欢喜的结局,它经常留白,在狂欢的顶点戛然而止——但片尾出现的Happy End(而非End)还是为巴尔干地区的年轻人留出了希望。爷爷告诉扎雷,离开是明智的,家乡没有太阳。最经典的婚礼发生在《地下》,所有人死而复生,沉浸在喜庆欢庆中,没人看到脚下的土地裂开了,将他们从更大的土地中分裂出来,沿着河流越飘越远。

除了婚礼,动物是库斯图里卡电影非常重要的隐喻。他称自己是“马戏团的头儿”,相信自然是所有宗教、所有存在的根源。库斯图里卡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动物是大白鹅、猪、猫和山羊。《黑猫白猫》开头的荒诞性在于,猪在耐心地吃车,大白鹅和吉普赛人一道围观德国游船的婚礼。黑猫和白猫分别象征厄运和好运,出现在玻璃窗外、死去爷爷的屋顶上、房间里,全程围观吉普赛人的婚礼。婚礼高潮,大白鹅被用于擦粪便,加剧了现场的混乱性。《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》(2016)用两分钟的开场镜头拍猪被杀,大白鹅不小心浸到猪血染缸中,变成大红鹅。喝牛奶的蛇懂得报恩,关键时刻救了男人一命。山羊在“地雷战”中全部被炸飞,无一幸免变成“烤全羊”。《亚利桑那之梦》(1993)中,在阿克塞梦中不断游荡的鱼和气球,隐喻超越现实的不可能性。“飞翔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哥伦布还在世,他一定会了解我……”,“美国梦”的外壳下,依然是库斯图里卡荒诞的喜剧内核。

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基调下,角色成为世界观的行动者,呈现非理性的人物气质。《亚利桑那之梦》的妈妈有一个飞行梦,女儿则热衷于自杀,死后能变成乌龟,她邀请阿克塞玩古老的“自杀游戏”。《爸爸去出差》的自杀者下定决心用绳子结束生命,结果只听到马桶冲水的声音。爷爷重复“生者和生者在一起,死者和死者在一起”,忽然死去。因为婚礼和葬礼不能同时进行,而男方拒绝了葬礼结束后40天再办婚礼的请求,大家用冰块保存爷爷的尸体,让其不得不在后天“死”,结果爷爷在第二场婚礼前死而复生。《黑猫白猫》。《牛奶配送员的奇幻人生》中的男人被战乱射掉了一只耳朵,女人直接用针线将其缝回。女人死了,去了天堂,男人数年后偶遇战争后的乌托邦,重逢女人。《生命是个奇迹》的背景是波黑战争,这是库斯图里卡最直面战争现场的一部电影。萨拉热窝的冲突白热化,主角卢卡是一个铁路工程师,拖家带口跑到波斯尼亚山区修旅游轨道,无视渴望成为歌剧家的妻子和渴望成为足球运动员的儿子的需求。他认为铁托时代能够和平,“不会发生战争,这里的人都很理智”,甚至听到儿子的入伍报道消息欣喜若狂。服役后,其实是上前线,成为俘虏,成为数字。他和“敌对阵营”撒巴哈的爱情更不可能成真,他们认知中的“澳大利亚”没有冬天,也明白自己永远到不了澳大利亚。

有一种说法是,好导演一辈子都在重复处女作——意思是很多导演的风格在前期就已成型。就像奥登在《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》序言认为,大诗人和小诗人的区别在于创作广度、深度等方面,一个好导演可能偶有“失败之作”,但整体的影像风格是可被辨别的。库斯图里卡就属于这一类导演。他持续在民族与历史深处拍电影,创作后期比前期更超现实、魔幻,不变的是探索“在历史长河中我们身处何处?”在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,世界的艰难时刻暂时消失了,土地飘向海洋,但巴尔干的音乐不会停止。

(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青年教师)

从前我一直认为,作为音乐剧,《悲惨世界》是无与伦比、难以逾越的,它是多种高超元素跨越时空的神奇聚合,其恢宏与精微,难以重现,不可复制。当我领受到《星幻》的魔力后,方知另有一部法语音乐剧与《悲惨世界》等量齐观,尽管这个美妙的体验来得有些晚。

为纪念《星幻》诞生40周年,托马斯·乔利在2019年3月启动了浩大的复排工程。日内瓦大剧院芭蕾舞团总监西迪·拉尔比·切卡尔奥伊担任编舞,维克多·勒马斯尼担任音乐指导,路易威登艺术总监尼古拉斯·盖斯奇埃尔担任服装设计。词作者吕克·普拉蒙东开放了他珍贵的历史档案。托马斯·乔利说这种用自己的指尖触摸传奇的感受无以言表。“三年来我神魂颠倒,一块一块地拆除这座纪念碑,然后翻新它,掸掉灰尘……”2022年11月8日,新版《星幻》在位于巴黎布洛涅-比扬古的塞纳音乐厅隆重回归,取得令人惊叹的成功。自2024年1月末开始,新版《星幻》开启了法国巡演、世界巡演的征程。

《悲惨世界》原产于法国,可与《星幻》构成法国音乐史上的“双璧”。

幸与不幸的是,这“双璧”还真是结对而来。1979年,具有前卫气质的“摇滚音乐剧”《星幻》先期诞生,无数观众为之癫狂,成为法国音乐剧开宗立派的鼻祖;1980年,史诗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继而出世,两个传奇作品接踵而至。遗憾的是,从1985年伦敦的英语版开始,《悲惨世界》才真正迎来成功。或许一方面要怪两部杰作“生日”太近,《悲惨世界》如洪钟大吕,澎湃浩荡,需要观众有个好胃口去吞咽与消化,而彼时观众对《星幻》的高热迷狂尚未褪去,还来不及清空肠胃情他顾,而且两剧的精神气质又截然不同,一时频道转换不及;另一方面,在花团锦簇的幕后另有着局外人难以想象的委屈辛酸:《星幻》首演



托马斯·乔利与音乐剧《星幻》：

用指尖触摸传奇

□露那

日,演艺界时髦人士悉数莅临,但演出结束后创作者们失落地在后台,几乎无人搭理,面对惨败,编剧吕克·普拉蒙东只好自我安慰:《卡门》《蝴蝶夫人》当年也不被看好。评论家声称:“很遗憾,这不是我们期待的(我们的)《西区故事》。”当时的法国人普遍认为音乐剧是属于百老汇的,对于创立法国自己的音乐剧既乏雄心,也没兴趣。而来自观众的汹涌热潮与赞美,最终让《星幻》“封神”。

每个传世之作的诞生本身就是传奇性的,但彼时并不自知,它们达成的功业与影响也往往始料未及。

《星幻》的结构严谨精美,内核深邃锐利,上连天宇,下接众生,既连接历史,又指向未来,兼具预言、科幻、反乌托邦、社会批判的多重维度。每年都有新的年轻人涌入剧院,他们为之着迷也为之诧异,这样神奇的音乐剧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?作曲家米歇尔·伯杰是一位下笔如神的音乐天才,他对发生在加州1974年美国媒体超级富翁赫斯特的孙女帕蒂的绑架案产生了兴趣——这起绑架案当年的话题热度甚至超过水门事件。活跃于上世纪70年代的极左恐怖组织德国红军旅(RAF)及意大利红色旅(BR)的人物与史实,也是促发《星幻》创作的现实源头。

故事将时间设定在想象中的2000年,整个西欧合并为一个国家“大西国”,地点设定在首都Monopolis,在这座霓虹灯取代了太阳的超级大都会里,出现了一个叫“黑星”的恐怖组织。女主人公唱到:“从纽约到东京到处都一样”,“在公元二千年的城市,生活已更加便捷,人们拥有

烙印在背后的囚徒号码和皮肤上的星星标志”,人们试图“逃离地球,探索星辰”,“出发去火星或木星”……如今历史已经追上、印证并超越了这部神异的预言剧。剧中人物的设定在不同版本有所调整和更新,基础设置是三组恋人,其一是总统候选人地产大亨泽尔若与过气影坛桃色巨星黛拉;第二组是地下咖啡吧的侍者玛丽·珍与她恋慕的“与众不同的男孩”唱片店的摇滚青年齐格;第三组为全剧的核心人物:“黑星”首领约翰尼与电视主持人“水晶”,这组人物的形象定位,原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已弱化而趋于抽象,约翰尼更是褪尽悲剧英雄的色彩。此外,还有一个关键的诡异阴狠人物“乔装者”萨迪亚,一个总统竞争者“生态党”的环保活动家马拉布大师,有时再加上电视播报机器人、外星人。8个角色在总统竞选中穿插,由一档热门电视访谈节目《Starmania》(星幻)串联。不同的议题——政治、权力、极端恐怖主义、暴力威胁、名利崇拜、生态危机、城市孤独、娱乐至死、性别与变性、人工智能、斯德哥尔摩综合征、爱情、抑郁、死亡……在一首首歌曲中被触及:《Monopolis》《当我们降临城市》《商人蓝调》《乔装者》《一见倾心》《性感偶像的告别》《一个与众不同的男孩》《齐格之歌》《需要爱》《当我们一无所有》《今晚我们在Naziland跳舞》《一个忧伤者的求救》《石头的世界》……每首都成为跨越代际恒久传唱的经典,它们构成了法国最动人歌曲的合集,其音乐风格酷烈忧伤奇幻,摇滚朋克爵士流行杂糅并蓄奇争奇斗艳,并随世界流行发展不断演变。

最为触人心怀的是:从《星幻》的历史镜像里,依然能够照见上个世纪理想主义的灰烬。“水晶”恰如其名地折射了那个时代青春的恣意与叛逆,纯洁与迷惘。或许,青春的血色就是极致的浪漫,悲剧的极致便是美的毁灭,正如“水晶”中弹

而亡的瞬间,美碎裂一地。而“黑星”喻示着黑暗的极处正有着辉煌的闪耀,那是“水晶”不灭的纯净灵魂,也是绝望的地下世界里玛丽·珍永在的阳光之心。“我在我的黑夜里追寻着阳光”,相反,121层摩天大厦Naziland(纳粹世界)却是承载着无边邪恶与堕落的权贵空间。

《星幻》垄断法国音乐剧舞台20年,被视之为“国剧”。意外的是,作曲家米歇尔·伯杰44岁便遽然离世,致使《星幻》进军英美市场的计划最终搁浅。法国音乐剧开端即巅峰,登顶后免不了面临下滑与低潮,直到1998年《巴黎圣母院》诞生。托马斯·乔利执导的2022新版《星幻》壮观而精致,他很好地把握了致敬、怀旧、重塑之间的微妙尺度。塞纳音乐厅,当《星幻》欲从剧场的黑暗中起飞的时刻,一百台投影机从舞台上投向观众,世界开始在光影中不神秘地变幻、旋转、飞升,仿佛进入了一个异度空间或诗意宇宙。托马斯·乔利对光的运用臻于至境,“光是我最喜欢的工具之一,就如同画家手里的颜料一样”。他认为光能够充分表现“黑暗、神秘、非物质、永恒的能量”。

《星幻》再次俘获了年轻一代的新观众,更令人感动的场景是:剧场中有大量头发花白的观众,他们与舞台激情相和,他们的面庞与眼中闪烁着被唤回的青春……“剧末爆炸与浓烟的场景,让人想起2001年纽约世贸中心遭受袭击的画面”,“人类很难预测自己的未来。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经济、生态、政治和健康方面越来越不明朗的时期,这使得对未来的预测更加令人焦虑。”

托马斯·乔利1982年生于法国鲁昂,十余年前便因导演莎士比亚的《亨利六世》三部曲和《理查三世》而声名鹊起。对于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开幕式艺术总监的重任,并没有让他感到畏惧:“我喜欢现场表演的宏伟维度。”

(作者系戏剧评论家)